



??与其?生熊元?

著者	沈 国威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5
page range	213-223
year	2012-02-0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Yuan Fu and his Student Xiong Yuan ' E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6125

严复与其门生熊元锷

沈 国 威

Yuan Fu and his Student Xiong Yuan'E

SHEN Guowei

In May 1900 Yan Fu (1854-1921) fled Tianjin for Shanghai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While Yan Fu was in Shanghai, a young man from Jiangxi named Xiong Yuan'E (1879-1906) came to pay his respects to him, and eventually became Yan Fu's favorite student. Even after Yan Fu returned to Beijing in March 1901, Xiong Yuan'E continued writing to him for advice. After studying under Yan Fu, Xiong took first place in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1903. One of the questions on the exam concerned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erms of both language usage and content, Xiong's test answers naturally reflected Yan Fu's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is paper, articles written by Yan Fu and the test answers given by Xiong Yuan'E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Yan's and Xiong's principal ideas on the issue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o reveal heretofore unknown detail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en.

キーワード：严复，陈三立，熊元锷，科学

一、小引：严熊初识沪上

1900年5月天津义和拳乱起，严复“仓皇由津避地赴沪，所有书籍，俱未携带”¹⁾。至1901年3月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邀严复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止，在上海逗留了将近一年。严复到上海后，赁屋闸北长康里，还曾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如开名学会于上海，讲演名学；又曾参加唐才常所创立的国会，才常自为总干事，而举容闳为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²⁾，但是实质性的活动并不多。可以说严复在上海最开心的事是结识了江西青年熊元锷。严复回忆道：“复之得交季廉也以庚子。当此时，中国北方，啧啧大乱，欧美日本之兵，满于京师，皇帝奉太后出居陕，而复亦避地江南，江南与各国为约互保才无恙。秋，季廉至海上，先以书自通，继而执贽造吾庐，求得著籍为弟子。神采玉流，言论泉涌，灼然有以知其为非常人也。扣其

1)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1549页。

2)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60~61页。另严复离开开平矿务局后的行止如下：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以李希圣为编译书局总纂，以严复为总办。1904年严复辞译局总办职，返回上海。

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王船山以对。讲道籀学，相得甚欢”³⁾。严复在离沪北上时赠熊季廉诗云：“去年北方致大祸，至今万乘犹尘蒙。亦知天心未厌乱，南奔避地甘长终。岂意逃空得警欬，知交乃遇四五公。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心期浑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砢。人生行止不自诡，扁舟又欲随南风。临行执手无所赠，惟有真气如长虹。横流他日傥相遇，窃愿身道双加丰”⁴⁾。

严复北归后，“季廉书问旬月至”⁵⁾，对于离开上海以后两人的交往，严复在《熊生季廉传》中继续写道：“先是，朝廷以经义文弊，士争模袭声调，猥琐陈腐，不究义理之安，无以裁成人才，济时急。光绪二十八年，始罢帖括为策论，且令直省举经济才，江西学使者则以季廉应诏书，偕计至都下，昕夕必造吾庐，则已融会通贯，言下了然，虽李延平之得朱晦庵，其为乐不是过也。罢归，应癸未（按，应为癸卯）试，主者发问，多士夫所不能言，季廉条列旧所闻以对，蔚为举首，里俗荣之”。即在严复的教诲下，熊元锷以其丰富、扎实的新学知识荣登1903年癸卯恩科江西乡试的榜首⁶⁾。

科考试题和熊元锷的答卷如附录1所示。癸卯恩科虽然未能完全废止八股文，但是追加了策论。江西乡试的策题也如实地反映了清政府内部意欲改革旧的教育内容、建构新的学科体制的愿望。

本文通过发掘史料，再现严复与熊元锷始于上海的交往，以及在当时语境下的近代学术史之意义。

二、熊元锷其人

在分析严熊二人的学术传承交往之前，先对熊元锷做一简要介绍⁷⁾。

严复在《熊生季廉传》中写道：“季廉姓熊氏，名元锷，晚字师复，世南昌人。父辉祖，母雷。兄弟同产八人，季廉居次少”。熊的挚友陈三立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君南昌熊氏，名元锷，字季廉，一名师复，为严先生易也。曾祖讳世昌，祖讳谏和，考讳辉祖，官某县训导，有文学行谊，君生十七年而卒。曾祖妣氏吴，祖妣氏雷，母雷夫人。兄弟八人，君次居七，兄元鏊、元镗、弟元鏊尤与余亲善，皆美才”⁸⁾。关于熊的人品学问，严复说：“生而颖异，父母钟爱之。稍长，知自矜贵，不喜无用之学，为议论文章，皆切究利病。每众议盈廷，事莫折中，季廉为批隙导窍，为分析是非利害，如分水犀。（中略）笃于同气，尤爱穉弟元鏊，学为之师，疾为之母。善择交，平生气类，皆天下豪英。尤善义宁陈君三立。居恒默观世变，

3) 严复《熊生季廉传》，《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104页。本文与《严复集》二所收《熊生季廉传》（273~275页）文字多有不同之处。《严复集》中，此处还有以下一段文字“适有季廉同里人，以高才巍科为名流所宗，向意季廉乡里少年，脱有崇拜，法当先及其门，而季廉愿舍彼取此，则大憾之。游说当涂，欲中伤季廉与其党三五人以危法，然而季廉湛然不为动也，会事解乃已”。

4) 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1 严复文集编年》，台北：1998年，246~247页。

5) 《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两人的书信，《严复合集5 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收严复致熊季廉信38通。

6) 严复《熊禧祖家传》（《严复集》二，354~355页）可见“严复曰：吾之始交南昌熊氏也，由熊季廉元锷，即传中所谓秋赋领解者也。当是时，清德宗方倡变法，罢八股文，以策论取士，故季廉魁其乡试，浸假而时论又变，则悉废科举，而大中小诸校之制立焉。盖将以教育之事，普及国民，其所议可谓闳远者矣。惜乎犹未睹其效也。熊君成就，不由学堂。顾其所立，卓卓如此，则吾安得起季廉于九京，而与之深论此事耶！

7) 涉及熊元锷的研究，管见所及有：熊柏畦《心远中学与熊氏兄弟》，《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99~104页。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277~287页。

8) 陈三立撰《熊季廉墓志铭》，《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106~107页。

隐然以天下为忧。而践履翔实，不妄取与，视纷华势利，泊如也。”

陈三立亦在墓志铭上写道：“君始为学好桐城方氏，湘乡曾氏所为书，故其意志皎然，论议文辞，崭口不苟。其后尽揽近人撰著译述言新法者，独服膺侯官严复氏之说，以谓渊览眇悟，根据道要，不为剽猎，偏曲蹇浅，犁然当人心，无如严先生者也。于是君年二十一，过谋其友陈三立，孤身走上海，执贄严先生门下”。

陈三立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之子，他在熊元锷墓志铭中追忆与熊交往的情形说：“先是余从先侍郎罢官居南昌也。君为论学书以达，先侍郎叹为重器。既见，猥执师弟子之礼。先侍郎弃其孤西山别墅，君来吊，余始识君。由是交日密，言议意趣，益符契无间。两人者交相引重，世亦颇知之。盖余尝略阅四方贤士，即吾乡后起俊髦，亦往往有闻焉。然欲得志高而学劬，识沉而魄毅，砥德业堪世变，如君其人，杳未之屡睹也”。可知熊陈相识是在陈宝箴逝世的1900年，其后不久又与陈三立商量投于严复门下。熊元锷一年之内结识新旧学两大学者，严复又通过熊与陈三立亲交。

熊元锷成为严复门生之后不久，严复在信中对他的文章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此事固不可以文字计较短长。但无似既承厚爱，许在他山之列，自当以直谅自处。窃谓以贤者之年力才气，事事宜力争上游；则文字一道，言为心声，不可不加之意也。况以言感人，其本已浅；言而不工，感于何有？必求大作之疵，则下笔太易，语多陈俗，一也。过为激发之声，闻者生倦，二也。义俭辞奢，以己之一幅当能者之一行，三也。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宜熟读古书，求其声与神会，而下笔力求戛戛其难之一境；而又讲求事理，以为积厚流光之基”⁹⁾。

在严复的教诲下，熊元锷的学识、文章大有精进¹⁰⁾。陈三立说：“严先生亦惊其英亮卓犖，深相爱重，君之学亦日邃而月变矣。当是时，天下方多事。后生少年猖狂恣睢，异说蜂起，嚣杂靡一世。即君初时，盛气发愤，亦颇激昂，用高语惊座人。至是愈惩其害。研口极变，敛抑锋锐，归之大适”¹¹⁾。

1901年3月，与严复沪上分手后，熊元锷“还南昌，遂创设乐群学堂，后更为宗塾曰‘心远’。有学徒数十百人，君与弟季贞亦附其列，习海国语文图算。凡江西学堂历久有名誉，以君所倡设为最著。既补县学生赴岁试，则为学政吴君士鉴大赏异之，屡拔冠其曹，食廩饩，复举应经济特科，是岁复举癸卯科乡试第一，赴会试河南不第归”。对于科场的失败，熊元锷似乎并不以为意。严复也极赞赏熊元锷荣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季廉顾冲然，未尝以是稍自意也，求学益急。尝恨名声日甚，以此为人之事，誣诬滋多，不克息交闭门，期所学之日益可信”¹²⁾。

9) 严复〈致熊季廉〉，《严复合集5》，4～5页。据孙应祥、皮后锋的考证此信写于1901年初春（《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230页）。

10) 严复致熊元锷的信中说：翰札明秀，即书法亦进乎前。知足下不虚度日也。《严复合集5》，21页。

11) 陈三立撰〈熊季廉墓志铭〉，《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

12) 严复〈熊生季廉传〉，《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

三、熊元锷从严复那里学到了什么？

如陈三立所述，熊元锷1902年参加江西岁试，“为学政吴君士鉴大赏异之，屡拔冠其曹，食廩饩”¹³⁾，并被吴士鉴荐举为癸卯经济特科考生。1903年7月，熊元锷随吴进京后“昕夕必造吾庐，则已融会通贯，言下了然”。熊季廉在癸卯乡试中对“多士夫所不能言”的问题，“条列旧所闻以对，蔚为举首”。第二场策论的题目是：

西国学术 有形上形下之分 其已成科学者 凡几 要旨若何 何者最为切用 宜审其先后缓急之序 以资采择而收实效策

湖北学政李家驹¹⁴⁾等人为熊所加的评语为“详悉源流；洞达中外”。命题人为何出此问题，熊元锷答卷包含哪些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何种关联，严复的思想、主张在其中是否有所反映？本节笔者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1902年，京师大学堂乱后恢复，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摸索中，这就是策题出题的背景。策题的设问中包含这样一些问题：1、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术”如何能成为“一科之学”？2、西方的学术分为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其次第如何？3、以中国当时的形势，采用西方各学如何分别缓急，以速收实效？这些让命题者困惑不已的问题，同时也是严复做了深度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严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¹⁵⁾。

关于学之为学，严复指出：

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罄然，夫而后得谓之“学”¹⁶⁾。

文中的“学”无疑即西方的“分科之学”。按照严复的理解，任何一种知识要上升为“学”必须有组织、有系统（部居群分，层累枝叶；首尾赅备，因应罄然）、可以验证、有定义严谨的术语。这样的“学”既可做理论上的探究，也可应用（造福）于人类社会（即后文的“公家之用”和“专门之用”）。

1898年《天演论》刊行，在导言十八〈新反〉中，严复写道：

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岐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

13) 柴萼说：“吴士鉴典试江西。尤喜新词。解元熊生卷上士鉴批语。直奖其能摹梁文”。《梵天庐丛录》〈新名词〉，中华书局1926年，卷27，33叶下~35叶上。惟“解元”是1903年乡试以后的出身。

14)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光绪进士。1903年任湖北学政，后调东三省，不久该做京师大学堂监督，授学部右丞。严复在给熊元锷的信中说：不谓英贤褒为举首，此非所谓一鸣惊人者耶！李柳溪固自有具眼哉！《严复合集5》，30页。

15) 以下议论亦请参见：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翻译史研究》第一辑，2001年，114~137页。

16) 〈救亡决论〉，《严复集》一，52页。

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为重也¹⁷⁾。

这段文字是从下述的原文敷衍而来的：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scertainment, by the same method of observation, experiment, and ratiocination, as is practised in other kinds of scientific work, of the course of conduct which will best conduce to that end.¹⁸⁾

即，古代分为形上、形下的二种学问，现在已经合二为一了，这是形上之学也遵循形下之学的三大原则的结果；严复指出：实测、会通、试验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要素，缺一不可，其中“试验尤为重也”。英国听众不需要的背景知识，对于当时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故严复不得不加入了原文所没有的内容。严复还在讨论伦理进化和同情心的导言十四〈怨败〉中加入了一句自己的话：“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意即，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规律（真理），而不是审判人类的善恶丑美。

1897年秋《国闻报》创刊，严复在沉默了两年之后，开始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898年9月22、23日严复在《国闻报》上连载了《西学门径功用》¹⁹⁾，这是严复在通艺学堂所作的演说辞（9月18日）。严复在本篇中对西“学”之方法做了较之上引《天演论》更为详细的阐述：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悞，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即探索真理的“学”，首先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的观察（考订、演验），然后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分类（贯通）；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现象的之所以然做出解释，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典礼，或大法公例）。中西古代的学问家，不管其成就的高下大致只做到了这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悞”。近代以降，西方的学者引入了“试验”，即对“大法公例”加以检验，以纠正观察和总结规律时的错误，这正是近代科

17) 《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44页。

18)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1902年复刻版, p. 43. 这段原文的现代汉语译文为：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我认为应该用其他科学工作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观察、实验和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最有助于达到此项目的的行动方针。《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3年30页。惟文中的“推理”似应译为“验证”即严复的“试验”。

19) 《严复集》一，92~95页。

学精神的诞生。严复指出中西二学之不同在于西学重视“读无字之书”而不读“第二手书”，以观察为起点，注重实践，不“为古人所蒙”。严复告诉听众：

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中略）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内导”即归纳，“外导”即演绎，演绎法的掌握与运用是科学进步的象征。在此，严复再一次谈到了科学的社会功用，并强调科学的非功利性更为重要，说：

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二、公家之用。何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

1902年初夏，严复在《外交报》（第9期1902.5.2、第10期1902.5.12，署“瘴壑堂来稿”）上连载了一篇名为《论教育书》的文章（收入《严复集》时名为《与外交报主人书》²⁰⁾。这是严复对《外交报》第3期（1902.3.4）上的文章《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的回应。

当时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议论百出，代表性的有：（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乙）西政为本，西艺为末。以及《外交报》载文的主张：基础教育应该使用本国语而不是外语。严复逐条加以驳斥，说：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错乱”。什么是“艺”？不就是指“科学”吗？逻辑学、数学、化学、力学都是“科学”。这些“科学”总结、积累了无数“通理公例”，西政中好的部分都是根据这些通理公例而建立的。赫胥黎说：西方的政治还没有完全遵循这些“科学”的原则，不然，西方的政治还不止现在的水平。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差，不足以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不遵循“科学”的原则，所行与“科学”的通理公例相违背的缘故。在严复看来一般被认作形下之学的“西艺”恰恰完整地体现了“实测、会通、试验”的近代科学之精神，所以如果将“科学”视作西艺，那么“西艺实西政之本”，而不是相反。论者或说西艺不是“科学”，那么西政西艺就都出于“科学”（即两者均为科学的下位概念），就像左右手那样，本来就无所谓本末之分。在这里，严复的“科学”实际上具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含义；前者指称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形下之学，后者意为统括形上、形下二学的知识体系。

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在为制定的译书局章程中提出：基础课程教科书的翻译“应取西国诸科学为学堂所必须肄习者，分门翻译”²¹⁾。所谓的“诸科学”，严复解释道：“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统挈科学分名、数两大宗，盖二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故称统挈也。间立科学者，以其介于统挈、及事二科之间而有此义也。间科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

20) 即〈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三，557~565页。

21)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严复集》一，129~130页。本章程连载于1903年8月29、30、31日三天的《大公报》上。

科学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舆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

至于接受西学各科的缓急次第，严复在讲演《教授新法》²²⁾中说：某陈姓御史上书朝廷，声言废除了八股以后的学堂讲授语言、物理、化学等课程，这些内容都和学生毕业后成为治理国家之才无关。其人根本不懂教育，人的思维可分为“思理”和“感情”两种，前者可以用“是非然否”作判断，后者只是“心之感觉”，没有“是非然否”的问题。严复指出：“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而智育多用科学”。严复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其目的是要发现“自然规则”。严复创造“自然规则”一词代替了以前使用的“大法公例、通理公例”。严复同意赫胥黎的意见：教育的目的在于“开濬心灵，增广知识”，如果“教育得法，其开濬心灵一事，乃即在增广知识之中”。那么在“有限学时之中，当用何种科学为之”，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呢？严复说：演绎性的数学、几何，归纳性的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诸科都不但能增加知识，而且有“治练心能之功”。严复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于“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皆太少”；偏于美术，短于物理；演绎性的多，归纳性的少；“所考求而争论者”都不需要“求诸事实”；所以“学成而后，尽成奴隶之才”。欲“疗此痼疾”，严复开出的药方是多学“物理科学”。严复所谓的“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天文、地质、生理、心理诸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和一部分人文科学。严复认为物理科学既可以改变中国的“士民心习”，又可以推广实学，对于富强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严复的这种思想在稍后的同为青年会讲座的《政治讲义》中再次得到了发挥。在讲座中，严复开宗明义首先指出：“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迹。”所谓“已成科学”即形而上的政治也采纳了形而下的分科之学的基本原则。接着严复分析了“学”与“术”的不同之处：“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在这里严复再次重复了“学”与“术”的关系，指出“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接下来，严复以动物植物学为例阐述了治政治学的方法：“（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严复认为“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是典型的归纳性学科，以动植物学为例来说明政治学的治学方法不能不说是饶有兴味的。

在简单地梳理了严复对“科学”种种主张之后，我们再来分析熊元锷策问答卷的内容。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学科的分类上，学科名称、叙述语言等熊元锷与严复几乎完全相同（见下表）；关于学术的“普通之用”和“专门之用”的区别，熊的回答也和严复的主张相吻合。只是“宜先其实学而后其空言，急其会通而缓其偏至。使学者之心思模范于朴茂不可摇之真理，而杜绝其叫嚣不可近之浇风”一段，熊元锷是否真正领会了严复关于形下形上（形气道德）二学关系演进之学说则无法立断。

22)《严复合集5》143~157页。本文后半部分即《严复集》二的〈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成文时间为1906年，笔者前稿《严复与译词：科学》误为1903。

熊元鐸策问答卷学科分类一览表

元科（严复为统掣科学）	名 学	名学
	数 学	（空间）几何、平弧、三角、八线、割锥 （时间）代数、微积分
间科（严复为间立科学）	力 学	动力学、静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
	质 学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著科（严复为及事科学）	天地之学	天文、地质、气候、輿志、金石
	人物之学	解剖、体用、心灵、种类、伦理、生学、群学、历史、法律、财政、军事、农工商、动物、植物

四、熊元鐸去世

严复在《熊生季廉传》中写道：“季廉之以礼部罢归，浙、皖、赣、闽自办铁路议起，乡之人推举之，令驻沪司通转。季廉心喜与复近也，则欣然应之。既至沪，而吴淞有复旦公学者，聚数十百少年，茫然不知所向，则又群起挽季廉持校事。季廉素重教育，尝以谓救亡之事，莫此亟也，则又诺之。由是冒犯风雨，冲涉波涛，既往日本，为铁路稽验成法，数月而归，又为淞校办筹樁柱，盖期月之中，无一顷得自暇逸。至丙午正月，而季廉始病矣。自溢强固，即少愈，不自休。洎暮春，其病遂笃。复于是时，适以事赴安庆，行时，即榻前与季廉别，泪眶盈盈，若去乳子。复至皖，不数日，以急电召归。诸医束手，乃议开割，既割而疾终不治，乃死²³⁾。

陈三立撰墓志铭云“赴会试河南，不第归。浸寻去居上海，从严先生游处讲肄，会以筹江西铁路及监复旦公学，劳累致疾益剧，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月二十九日遂不起，得年二十八。卒后几日得君绝命书，枕函中絮语老母家人外，并及严先生与余云”²⁴⁾。

严复极其悲痛，三年之后为其作传时回顾当时的情形：“方其在医馆弥留，与复四目相向，但闻季廉微呼先生而已。盖季廉目瞑而意无穷，距今三年，不佞每怀音容，未尝不伏面流涕至失声也。呜乎，天夺此贤，酷已！”感叹“昔韩愈为欧阳詹生哀词，谓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范嶷嶷然。观其心，有益于愈，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愈之于詹，与余之于季廉，其情事岂异也哉！且愈既为文，又自书之，缀其后曰：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此其事又与余合。嗟乎，向使季廉无死，其道德功业，学问文章，所自表见，岂仅如向所云而已，此不佞所为掷笔慨叹，不知彼苍生才之意谓何也！”并作挽联哀悼熊季廉：

与君同为国伤心，何堪憔悴江潭，楚些翻成悲宋玉，
此业不蒙天所福，枉自张皇幽渺，玄经哪更问侯芭。

数年后，“熊季贞病起，抱其兄季廉之孤取影，寄余索诗，为成八章，以‘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为

23) 《南昌文史资料》第一辑，104~105页。

24) 《南昌文史资料》第一辑，106~107页。

韵”²⁵⁾

贤兄昔在日，抗志造世英。轩然入世网，百莠擢一稂。
良苗不待秋，玉树忽已倾。时会犹非欤，吾欲谏天明。

生离有逢期，死别乃恻恻。自我失熊子，摧痛常在臆。
恭惟皇上帝，所辅必有德。巫阳倘下招，聚首期天国。

太息观世道，百川日东之。孝友似吾子，威风忽来仪。
寂寞泉下兄，羸老堂上慈。况复揩泪眼，载视怀中儿。

吾闻爱髮肤，君子重所受。慎疾如避仇，临难固不苟。
聚散理何常？异者特先后。愿恒持此观，幸勿自击掇。

茧栗兆破车，馱馱生七日。允矣天演谈，种业类传驿。
今观象影中，颡丰目点漆。鸾翻去不还，鸡群鹤可必。

忍死抚遗孤，钦哉此贤妇。靓饰朝慈章，饮泪不可久。
闵闵望长城，此外吾何有！君看南山松，真气弥九亩。

茫茫揽神州，人事纷乖刺。川岳闕其精，輶饥想贤达。
生之既大难，俄顷旋见夺。呜呼吾生乎，乃草闲偷活。

穷理贵不遁，经训难为陈。道固无变期，流行乃日新。
相民为计极，修己须安人。临终作笃语，副尔求书绅。

五、结语

熊元锷21岁时成为严复的门生，深得严复赏识，结为忘年之交。28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溘然去世，令人扼腕。

熊元锷留下的文字不多，他给严复的信或“絨高半寸”²⁶⁾，曾令严复兴高采烈，但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只能通过严复、陈三立留下的传和墓志铭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而熊元锷的策问试卷也许是他唯一传世的文章，从中我们又可以追寻严复的踪影。

25) 《严复集》二，366~367页。

26) 《严复集补编》，245页。

最后，谨附录熊元愕1903年江西乡试策问答卷和严复赠熊元愕诗，作为对两位伟大的先学的缅怀。

附录1：

熊元愕答卷

第二场策题：

西国学术 有形上形下之分 其已成科学者 凡几 要旨若何 何者最为切用 宜审其先后缓急之序 以资采择而收实效策

横尽十方，竖尽尘劫，弥纶于凡我人类所可栖息之处，挟无对之力，争无形之胜。大之为体国驭群之所资，小之为利用前民之所赖，而为一切事物原理之所从出者，其学术乎哉！其学术乎哉！曩近三百年来，泰西学者积其媵心缮性之用，制为内籀外导之方，操必然之权，责未然之效，寔强寔富，绝景而驰。继今以往，方且潮长川增，蒸蒸日上而未有已。就其已成立之科学言之，夫固足以牢笼万化，纲纪全球矣。一曰元科、二曰间科、三曰著科。三科者为一切西学所莫能外。元科分名数两大宗，名学所以定思想语言之法律，数学有空间时间。空间如几何、平弧、三角、八线、割锥；时间如代数、微积之类。盖二学所标之公例，精微洁净，妙万物而为言，取一切形神道器、表里精粗而莫不苞举。用以察不易之事理，究不通之物情，其功最宏，其用最溥者也。间科分力质两门，力如动力学、静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皆其属也。质如有机、无机二化学，所以名曰间科者，以其立于元科著科二者之间也。盖必力质学明，然后知事证符验之相待。无无因之果，无无果之因，因同则果同，果钜则因钜。一切怪妄妖异，休咎襍祥之说，俱不足以惑之矣。而其用之尤大者在于民生日用制器尚象之间，切于人事，莫过乎此。至于著科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輿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伦理、有生学、有群学、有历史、有法律、有财政、有海陆空军、有农工商。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凡此，所以使心德之能习于悠久蕃变、博杂错综之故。用前二科之公理大例，以考专门之业，而研至深之几者也。此三科大略也。盖恍言之，则有形上形下之分，精言之，则是三科者乃统挈之而无遗义。英儒培根有言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小大，无贫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真为学之真谛也。顾勤学之时月有穷，生人之精力无几，虽欲兼营并骛，其势不能。但使于元科得其法则，则于间科得其用事，于著科得其效成。其于学也，亦庶几矣。抑尤有要者，学问之事，体一而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普通之用，普通之用所以炼心制事。培根所言学者之事是也。专门之用则如算学用以核数，三角用以测量，化学用以制造，电学用以敷电，法律用以司直，植物学用以敷栽种之类。含生之族，所以用其手足之勤，心思之智，食于其群是也。程功之初，宜先其实学而后其空言，急其会通而缓其偏至。使学者之心思模范于朴茂不可摇之真理，而杜绝其叫嚣不可近之浇风。庶异时学成有起弱疗贫之实效，破旧学之拘挛矣；又能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以不与守死握固者，相齟齬而伤于两败。此真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斯宾塞曰天下大势继此将皆视学术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呜呼，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尚虞勿及，吾愿谋国者早为之所焉可耳。

附录 2 :

严复赠熊季廉²⁷⁾

一十九棋初告终，搏搏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大哉培根氏告我，即物观道冥纤洪。至人先天戒凝滞，高下体合如张弓。
从其后鞭向仁寿，岂假食苦师蓼虫。三皇五帝各垂法，所当时可皆为功。
蚩蚩之氓俾自治，奚翹洲渚浮滕臃。及其已过尚墨守，无益转使百弊丛。
矧今天意存混合，殊俗异种终棣通。是时开关用古始，何异毛毳当炉烘。
履而后艰常智耳，如怨弗愆宁自懵。四百兆民皆异种，卒使奴隶嗟神恫！
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贤愚度量几相越，听者一一褒耳充。
胶胶扰扰何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祸，至今万乘犹尘蒙。
亦知天心未厌乱，南奔避地甘长终。岂意逃空得警效，知交乃遇四五公。
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心期浑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砿。
人生行止不自诡，扁舟又欲随南风。临行执手无所赠，惟有真气如长虹。
横流他日傥相遇，窃愿身道双加丰。

鸣谢：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孙青博士、清华大学孙晓莹同学在资料查找解读方面给予笔者的无私帮助。

付記：本稿は2011年度夏期中国東北大学交換研究者プログラム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研修にあたって、種々の便宜を図ってくださった方々にお礼申し上げる。

27) 《严复合集 1》246~247页。

